傅家**DNA**的历史意义

**——血缘社会与聚落群聚形态**

裴安平

2025年6月5日早晨6点，“我心飞扬”，因为在手机网上看到了北京大学与山东文物考古研究院关于山东傅家遗址的DNA研究成果。这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次从自然科学的视角证明了人类社会早期母系氏族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还在世界上第一次证明了氏族社会存在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群聚现象，从而为中国史前文明探源指出了一条必由之路。

**一**

事实上，世界民族学资料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footnote-0)**、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2]](#footnote-1)**，早已论证人类史前是血缘社会，其中母系社会早于父系社会。

然而，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西方的社会科学也同步怀疑和否定了母系社会的存在，如爱德华·亚历山大·韦斯特马克（Edvard▪Alexander▪Westermarck）1926年出版的《人类婚姻史》**[[3]](#footnote-2)**，1974年琼▪班贝格(Joan▪Bamberger)的《母权神话：为何原始社会由男性统治》(The Myth of Matriarchy：Why Men Rule in Primitive Society)**[[4]](#footnote-3)**一书,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西方的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国内学者的认识，北京大学教授吴飞的《母系社会根本不存在》**[[5]](#footnote-4)**就是代表。

不过，2025年6月4日，Nature在线发表了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的一项关于中国史前母系社会的重大研究成果，题为“Ancient DNA reveals a two-clanned matrilineal community in Neolithic China”**[[6]](#footnote-5)**。其中，在全世界第一次用史前的DNA样本证实了史前确实存在过母系社会，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本世纪全球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科研结果还为中国考古学的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河洛古国”根本不存在**

在专家们的支持下**[[7]](#footnote-6)**，2020 年 5 月 7 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双槐树遗址“古国时代”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等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并点评确认其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主要的理由是面积大，是仰韶文化时期从郑州到洛阳近150公里这一广大地区里规模最大的“巨型”聚落遗址，达 117 万平方米；而且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 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郑州西山、点军台、大河村等仰韶文化城址和遗址都对双槐树形成了地缘化的拱卫之势**[[8]](#footnote-7)**。正因此，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就在于，实证了仰韶文化中晚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与此同时，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不仅是黄河文明之根，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而且双槐树遗址就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凸显了它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和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流域的政治文明核心地位。

可是，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的DNA研究结果，却证明“河洛古国”的认知完全错了。

双槐树遗址的年代与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傅家遗址基本相同**[[9]](#footnote-8)**。可是，当傅家遗址的社会发展阶段还处在母系氏族阶段的时候，同时期的双槐树却令人匪夷所思地跨越了父系社会阶段，并急速进入了古国阶段。

一般而言，发展是不平衡的，双槐树进入了父系社会阶段还可以理解；但肆无忌惮地从母系直接跨入古国就不太可能了，这显然是人为无根无据抬举的结果。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荒谬的结果，充分说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以遗址个体规模大小论英雄的思维方式是极端错误的。

**二、湖北、河南、安徽是中国率先进入父系社会的核心地带**

已有资料显示，中国新石器时代距今4500年以前所有适合父系个体家庭居住的排房、套房全部都位于湖北、河南、安徽这三个省区。其中，湖北的应城门板湾[[10]](#footnote-9)、襄阳雕龙碑[[11]](#footnote-10)所见套房，河南淅川下王岗[[12]](#footnote-11)、邓州八里岗[[13]](#footnote-12)、郑州大河村[[14]](#footnote-13)所见排房和套房，安徽的蒙城尉迟寺[[15]](#footnote-14)所见排房，就都是当时的代表。

这种现象说明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而湖北、河南、安徽这三个省区则是全国率先进入父系社会的核心地区；至于距今约4750-4500年的山东傅家遗址的DNA研究结果则说明，核心周边地区当时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

这种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对中国文明探源的研究工作极具启发意义，它表明古国很可能就首先诞生在这个核心区域。

**二**

山东傅家遗址的DNA研究成果不仅从史前血缘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给中国史前文明探源提供了重要启发，而且还从史前社会结构的角度为中国史前文明探源提供了更为重要的启发。

**一、证明聚落与遗址是不同的概念**

根据已有的报导，傳家遗址总共37万平方米，共存二个母系氏族。

这说明聚落不是遗址，说明以氏族为单位集中居住的形式和场所才是聚落；而承载了各种人类历史遗迹遗物的场所和地点则是遗址，承载聚落的就是聚落遗址，承载古城的就是城址，承载造船厂的就是造船遗址。因此，文明探源首先要搞清楚遗址与聚落的关系。一方面，遗址上共存的聚落数量可能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同一个遗址各聚落的地位也可能互不相同。诚如山东日照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尧王城[[16]](#footnote-15)，如果不明白遗址与聚落的关系就不可能明白该遗址小城、大城、小环壕、大环壕的归属与历史意义。

**二、证明聚落群聚的确是****史前血缘社会普遍的社会组织方式与居住方式**

所谓聚落群聚就是聚落相互以血缘为纽带零或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一种历史现象[[17]](#footnote-16)。

2004年，就此我发表了关于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第一篇文章[[18]](#footnote-17)。虽然我的研究根据的是全球民族学的资料与中国的考古发现，而且就中国和世界范围而言都是考古学的重大理论创新[[19]](#footnote-18)。可是，时间过去21年了，关于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不仅至今无人问津，还对作者进行了无情打压和排斥（附件）。

今天，我要特别感谢山东大汶口文化傅家遗址的DNA研究，它不仅证明这个遗址同时居住了二个氏族，是个由双聚落构成的聚落群同时居住的遗址；还证明史前确实存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群聚现象。更重要的是，还证明了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由于聚落的群聚现象完全是史前血缘社会普遍的社会组织方式与居住方式；所以，它就是以人为本，先复原史前社会再研究史前社会，并探索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

中国考古学之所以至今尚未探到文明之源，关键就因为脱离了史前社会的实际，对考古资料和发现意义的理解，都像“河洛古国”[[20]](#footnote-19)一样，自编自导。

**三、证明****中国史前文明起源的标志就是血缘组织的一体化**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类的聚落就存在群聚现象，如安徽水阳江流域的宣州市孙埠镇洋山遗址，100万平方米[[21]](#footnote-20)，是大汶口文化傅家遗址面积的近3倍，因而很可能就是当时的一处多聚落遗址。在这种遗址中，所有成员没有地位高低不平，只有相互独立平等，更没有具有防御功能的公共设施。

但是，中国的考古却显示聚落组织的一体化就是文明起源的标志和特点。

早期“一体化”的特点就是：1、以聚落群为单位；2、不再以血缘，而是以实力为组织基础；3、组织成员地位分化，出现了核心成员；4、核心成员有壕（濠）沟环绕保护。

发掘与调查表明，山东傅家遗址就是以聚落群为组织单位的一体化聚落群团的代表。

1、傅家遗址本身2个聚落构成的就是聚落群团内部的核心聚落群。

2、在傅家遗址即核心聚落群外围环绕着一条宽10-20米的防御性壕沟[[22]](#footnote-21)。

3、“从发掘情况看，它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与之相连的还有荣庄遗址和五村遗址，荣庄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五村遗址总面积7.5万平方米”[[23]](#footnote-22) 。

**四、证明聚落群聚形态就是文明探源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全世界人类历史时期的研究都会以国家为单位，因为国家是地缘社会的人类组织，也是地缘社会人类的居住与生活范围，更是地缘社会人类历史的载体与演变平台。正因此，血缘社会的研究也应该以血缘社会的组织为历史研究的单位、载体和演变的平台。

实际上，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早已表明，人类与生俱来就有血缘组织，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大田洼台地不足2平方公里群聚的最早距今一百万年以前的9处旧石器早期遗址就是代表[[24]](#footnote-23)

以往中国文明探源的研究之所以一直都没有找到文明之源，即使是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石峁古城，也没有一个说清楚了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明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的特质是什么？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什么？中国文明起源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什么特点？显然，中国文明探源距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了！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史前历史的组织、载体和演变的平台，而是自编自导，如蛮横地将东西纵横近150公里郑州与洛阳之间的地域都划归“河洛古国”门下就是典型例据。

今天，山东傅家遗址DNA研究结果最大的启发就是告诉人们只有血缘组织才是研究血缘社会历史的载体和平台，而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群聚形态就是血缘组织的物化形态，就是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载体和平台，就是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

**结束语**

实际上，在中国考古学文明探源工程距历史真相越来越远的今天，山东傳家遗址的DNA研究成果不仅告诉了人们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史前是一个血缘社会，因此任何关于史前历史的研究都不能离开以人为本的血缘组织的研究。

为此，中国考古学必须借此端正文明探源的思路，摈弃脱离实际并自编自导的“区域聚落形态”[[25]](#footnote-24)的理论和方法，回归史前社会原本的历史状貌，回归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群聚形态的正道上来！

但愿中国考古学文明探源工程能够警醒！

**附件：**

打压和排斥大事记

裴安平

1. 近20年来，《考古》、《考古学报》、《文物》、《中国文物报》没有发过我一

篇文章；全国各文物考古刊物也不敢发我的文章。不是我没有投搞，而是都退回来了。

2、由于我是苏秉琦、俞伟超先生为数很少的学生之一，所以近20年来只到北京大学参加过他们的纪念会。此外，没有人邀请我参加过任何一次全国性的考古会议，即使是史前研究会也不让我参加。

3、虽然我曾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湖南省考古学会秘书长，对湖南省的文物考古事业贡献颇大，但近20年来湖南省从未邀请我参加过任何考古会议。

4、2013年，由于《南方文物》发表了我的《山西临汾盆地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一文，有人对此表示了不满。于是，《南方文物》办刊“要讲政治”，再也不敢发我的文章了。

5、2015年，我有幸参加了《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靠前宣读了《文明探源，源在何方》一文。可是，会后有人打电话给湖北，要他们不要发表我的文章；以后也不要请我开会，因为我到处放炮。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湖北考古人，他们居然顶住压力，在会议论文集的最后发表了我的文章。

6、2013年，由于我事先打了招呼，因而有幸在榆林参加了当年的石峁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事先提交了论文。然而，做梦也没想到，会议领导会把我这个全国考古界都知道的老考古人安排在科技组参会和发言。尽管我当时就向会议领导提出了要求换到考古组的请求，但没有反应，而且会议最后的总结也没有提及我的意见和看法。

7、由于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我的论文集，所以我的《问道：当代中国考古学现状的反思和前瞻》只能拿到台湾花木兰出版（2022年）。

这就是近20年来，因为我认为中国文明探源走错了路，要走史前聚落群聚形态之路，所以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连参会发言和发表文章的机会与权力都不给。今天，北京大学和山东考古所发表了大汶口文化傳家遗址的DNA研究报告，证实血缘社会确实存在聚落群聚现象。我很高兴，也认为是时候要为我平反了。

实际上，我的错顶多也就是没有为现代讨好上级的文明探源工程增光添色而已。千万不要把不同学术观点当作阶级斗争，无情排斥，残酷打压。

悲矣！

1.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 [↑](#footnote-ref-0)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 [↑](#footnote-ref-1)
3. 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王亚南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footnote-ref-2)
4. 琼▪班贝格(Joan▪Bamberger)：《The Myth of Matriarchy：Why Men Rule in Primitive Society》，收录于米歇尔·津巴利斯特·罗萨尔多（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和路易丝·兰菲尔（Louise Lamphere）编辑《女性、文化与社会》（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footnote-ref-3)
5. 360安全浏览器:《人类真有过“母系社会”吗？北大教授吴飞：母系社会根本不存在》， <https://www.360kuai.com/pc/99f61d8d97ddb08bc?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2021年7月26>日。 [↑](#footnote-ref-4)
6. 刘桂秋：《世界首次！我国科学家确证存在史前母系社会组织，广饶傅家遗址刷新母系社会遗传学线索溯源》，新华社，2025年6月5日，<https://news.iqilu.com/shandong/yuanchuang/2025/0605/5818729.shtml>。 [↑](#footnote-ref-5)
7. 《河南日报》：《巩义“河洛古国”考古项目入选“2020 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新浪，2020 年 12 月 31 日，<https://news.sina.com.cn/c/2021-03-27/doc-ikkntiam8966252.shtml>。 [↑](#footnote-ref-6)
8. 王丁等：《“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新华每日电讯，2020 年 5 月 8 日，<http://cul.china.com.cn/2020-05/08/content_41144494.htm>。 [↑](#footnote-ref-7)
9. 中国新闻网：《山东考古取得重磅成果 全球首次考古证实母系社会存在》，2025年6月6日，<https://www.sd.chinanews.com.cn/2/2025/0606/94763.html>。 [↑](#footnote-ref-8)
10. 国家文物局主编：《199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P7。 [↑](#footnote-ref-9)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 2006年，P 。 [↑](#footnote-ref-10)
1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P166—183。 [↑](#footnote-ref-11)
13.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 [↑](#footnote-ref-12)
1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P168。 [↑](#footnote-ref-13)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P58-59。 [↑](#footnote-ref-14)
16.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0期，P12—21。 [↑](#footnote-ref-15)
17. 裴安平：《史前一体化聚落群团崛起的历史意义》，<http://peianping.com/lwzz12.html>。 [↑](#footnote-ref-16)
18. 裴安平：《澧阳平原聚落形态的特点与演变》，《考古》，2004年，第11期。 [↑](#footnote-ref-17)
19.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华书局，2014年。 [↑](#footnote-ref-18)
20. 裴安平：《“河洛古国”是真的吗？》，<http://peianping.com/lwzz12.html>。 [↑](#footnote-ref-19)
21. 房迎三：《皖南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调查简报》，《文物研究》第三期，黄山书社，1988年；《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埋藏学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2期。 [↑](#footnote-ref-20)
22. 知识贝壳：《齐鲁文化大辞典▪傅家遗址》，<https://www.zsbeike.com/cd/41811765.html>。 [↑](#footnote-ref-21)
23. 张九成：《冲上热搜的广饶傅家遗址，还藏着多少秘密》，《山东宣传》，2025年6月9日， <http://www.sdxc.gov.cn/sy/xcdt/202506/t20250609_16041706.htm>。 [↑](#footnote-ref-22)
24. 谢飞：《泥河湾旧石器文化》，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P16。 [↑](#footnote-ref-23)
25. 加里·费曼：《聚落与景观考古学》，《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P12;

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 [↑](#footnote-ref-24)